



顾祖禹与《读史方舆纪要》

孙庆峰 黄曙霞

顾祖禹(1631~1692年),字瑞五,号景范,江苏无锡人,后徙常熟,世称宛溪先生。其所著《读史方舆纪要》(以下简称《纪要》)问世后,受到广泛重视,时人将之与梅文鼎《历算全书》、李清《南北史合抄》合称三大奇书。

三十余年著一书

顾祖禹家学渊源深厚,父亲顾柔谦精通历史地理,是当时有名的方舆(地理)学家。从小跟父亲耳濡目染,顾祖禹受到了良好的学术训练。顾柔谦有强烈的爱国情怀,认为地理知识的匮乏与错讹是明朝当时军事失败的重要原因,所以立志写一本实用的军事地理著作,但因国家灭亡悲愤过度,以致身患重病,临终嘱咐顾祖禹完成遗愿。

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顾祖禹开始撰写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当时他的家境非常贫寒,为了写作,顾祖禹不得不紧衣缩食,积攒钱财来买书。买不到的书,他便四处去借,借后抄写,抄完奉还。他订有严格的写作计划,每天必写数个条目,数十年如一日,“穷年累月,矻矻不休”。

为写好《纪要》,顾祖禹广泛收集材料,力求竭泽而渔,不遗漏每一个可以获得的材料。他治学严谨,对收集到的材料都进行严格辨析与考证,确定无误后才采用。

除利用文献资料,顾祖禹还坚持实地考察,将纸上材料与亲身观察相结合。他广泛游历东南诸省,沿途考察城郭、山岳、河流、道路、关口,与商人、工匠、农民等深入交谈,访寻当地风土人情。

康熙十八年(1679年),顾祖禹终于完成《纪要》撰写,此时他已年近五十,距离开始写作已过去二十年。此后岁月中,他一直从事《纪要》修订工作,直到去世前仍在修改,用三十余年的光阴写出了一部地理学巨著。

万里河山藏卷中

《纪要》重点阐述历代行政区划沿革、山川险要、攻防利害,兼论历代战事的得失成败,是一部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融为一体的专著。全书将史事与地理相互印证,“以古今之方舆,衷之于史,即以古今之史,质之于方舆。”通过分析地理形势,进而更深入理解历史重大事件;通过考证历史重大事件,以便全面认知地理形势,因此顾祖禹将书名命名为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。

《纪要》全书一百三十卷,合计二百八十余万字。按照内容可分为四个主要部分。

一是历代州域形势,共九卷。从上古唐虞夏商周开始,一直叙述到明朝。每一个朝代都分析重大军事活动的攻守形势,论述区划设置沿革,让读者对形势的轻重、区划的变动了然于心。如晋代一卷,先叙述魏灭蜀、晋灭吴、永嘉之乱、十六国争斗等战争的军事地理形势,后论述晋代行政区划。

二是分省介绍,共一百一十四卷。按照明代行政区划,分北直隶、南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

陕西、四川、湖广、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依次论述。每一省又按府、州、县顺序分别列举,叙述地理方位、战略地位、建制沿革、名山大川、历史重大战役等。如北直隶昌平州(今北京市昌平区),顾祖禹先指出它具有重要战略地位,是京师的咽喉所在,“枕负居庸,处喉吭之间,司门户之寄,京师大命尝系于此”。接着详细论述昌平的军都城、万年城、巩华城、居庸关、白杨口、苏家口等战略要地,以及天寿山、军都山、白浮山、银山、榆河、官河、高粱河等山川险要。

三是山脉河流,共六卷。这一部分主要从宏观上论述中国境内太行山、大别山、岷山等主要山脉,以及黄河、长江、淮河、汉水等主要河流。通过山川河流的纵横交错,展示中国地理的经络。

四是星宿分野,共一卷,记叙历代关于天上星区与地理区域对应之说,阐释天文与地理的相互关系。

最后附有图表,计有全国、各省、边疆要塞、黄河、海运、漕运等地图二十余幅。

匠心独具的地理学著作

鲜明的军事色彩是《纪要》的重要特点。全书着眼于国防需要,详细论述地理形势、山川险易、军事要塞,对名胜古迹、旅游景点则简略叙述。每一省卷首撰有总叙,概论地理形势,同时引用大量战争史实,以展现成败之关键。每府、州、县同样是这种体例,但论述内容更为详细。

以南直隶(区划范围约为今江苏、安徽)为例,顾祖禹指出:“明初规画畿辅,跨江踰淮,幅员最广,夫亦保江者不在江南,保淮者不在淮南之意乎?”并引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保江南必须保淮南,江南淮南唇齿相依,没淮南则江南也难保。后世史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19世纪中叶,太平天国兴起,定都天京(今南京),占据江南,但未全力争夺淮南,导致后期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防守局面。清军后在南京北建江北大本营,在南京城外建江南大本营,对太平天国都城成夹击之势。而江北大本营的选址地扬州、江南大本营的选址地紫金山,顾祖禹在《纪要》中早已指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。《纪要》引宋代学者王应麟之语:“扬州俯江湄,瞰京口,南踞钜海之游,北压长淮之流。”点出扬州对于江南的重要性。又引南朝刘宋时书籍《丹阳记》指出:“京师(今南京)南并连岭,而蒋山(紫金山别名)岩峽巖峻,实作扬州(南京当时属扬州)之镇。”点明紫金山作为南京城外战略高地的重要地位。

区划沿革的详细考证是《纪要》另一个鲜明特点。中国历代正史的地理志往往局限于一朝一代的区划变革,而《纪要》则对四千余年区划变迁进行了详细论述,尤其对县域的分合、地名的变更、江河湖泊的变迁等进行了重点考证。以山东省无棣县为例,《中国历史地名辞典》只说:“隋开皇六年(586年)分阳信、饶安二县地置,治所在今河北盐山县旧庆云东南。”没有指出无棣县名的渊源。《纪要》则说:“无棣沟,在县南。相传春秋时即有此沟,分大河支流东注于海。隋开皇中因以名县,大业末沟渐填废。”两书相比,《纪要》点出了无棣县名源于县域内的河流无棣沟,这条河属于黄河支流,隋朝时逐步填埋废弃。这不仅对研究地名的演变,而且对研究黄河支流的变迁,都提供了重要的史料。

辩证思维是《纪要》的又一闪光点。顾祖禹虽然重视地理,但并不是地理决定论者。他指出地理战略优势的发挥,也需要人的努力,不能单凭地利,所以他强调“封域不可恃为强,城郭不可恃为固,山溪不可恃为险”。同时,自然地理的高下险易虽然是固定的,但是战争一旦发动,敌我形势却是不确定的,“州域之建置有定,而形势之变动无方”。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,审时度势,因势利导,才能发挥地理的优势。

据《学习时报》

《反“扫荡”》战歌的由来

抗战时期,江苏丹阳西南的延陵古镇是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,也是新四军“东进”“北上”的重要通道,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新四军经常从这一地区出击,打击日伪。1939年11月上旬,丹阳、金坛等据点的日军集结3000多人的兵力,采取“分进合击”战术,不间断地开赴延陵地区“扫荡”,企图寻找新四军主力部队决战。新四军一支队二团一部、新六团和地方武装丹阳独立支队等,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,在运动中寻机歼敌。

1939年11月8日凌晨,丹徒宝堰镇日军约三四十人至延陵“扫荡”,上午8时途经贺甲村东南塔路头村时被丹阳独立支队包围、毙伤10余人。日军残部依仗火力优势,退守贺甲村东约0.5公里的城河山制高点,并据此以轻机枪、掷弹筒疯狂射击,企图固守待援。这时,新四军一支队新六团两个营的兵力赶来增援,赶到战场后,立即从敌侧后发起猛攻,击毙敌人十余

人,缴获机枪两挺。敌人抵挡不住,只得向西突围,溃逃进贺甲村,企图继续顽抗。

12时,日军调来增援部队,突破警戒线进入贺甲村与村内残敌会合,并企图在优势火力支持下组织突围。关键时刻,二团部队赶到,将敌人“硬堵”了回去。敌人又向新四军反扑三次,均未得逞,被击毙十余人。二团三营进攻贺甲村北敌人,一营进攻贺甲村西北角敌人,敌人害怕阵地有失,开始施放毒气,新四军战士被迫暂停攻击,退出村外。

傍晚,狂风卷着阵雨来袭,据侦察员报告:附近据点的敌人本来已经出动救援,但由于风雨交加,无法前进,又退回了据点。新四军部队立即发起强攻。一营点燃稻草数堆,以浓烟为掩护,首先突入贺甲村;三营和新六团也相继突入。战士们和敌人展开白刃战,将敌人阵地压缩到村东南角祠堂内。战至9日凌晨4时,二团二营赶来增援,新四军士气大增。上午9时

许,二团二营四连先以一个排兵力摸索前进。接近祠堂时,隐藏在草堆中的敌人突然冲出,双方展开搏斗。四连二排随即冲上去助战,然后全连战士冲上去,把敌人压回祠堂。

10时,新四军各部发起总攻,二团战士在竹竿上绑束手榴弹,在祠堂西侧、南侧炸开3个洞口,紧接着向洞内投手榴弹,炸得困守祠堂的日军血肉横飞。残敌企图从北门向外逃窜,在打谷场上被二团、新六团包围、全歼。此战,新四军共击毙日军精锐十五师团池田联队所属官兵168人,俘虏3人,缴获轻机枪4挺、掷弹筒2具、步枪100余支。

战斗结束后,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向参战部队表示祝贺,并称赞二团是“老虎团”。新四军著名词作家罗汉、作曲家何士德以贺甲村战斗为题材作词作曲,写成《反“扫荡”》战歌,在新四军和敌后根据地广为传唱,极大鼓舞了抗日军民。 吴小龙 据《人民政协报》